



上圖為張國燾晚年的照相

細說張國燾(三)

· 費雲文 ·

遭受分共打擊 準備南昌

暴動

武漢方面，為了打開局面，鮑羅廷主張由武漢向北進兵，與已經參加國民革命軍的馮玉祥會師，進而打開經由外蒙與蘇俄聯絡的路線；同時，還可以與在山東的軍閥張宗昌妥協，對南京形成包圍作戰。這一辦法，得到陳獨秀等人的贊同。

張國燾反對此一路線，他贊成羅易（共產國際剛剛派來武漢的代表，印度人）的辦法：由武漢揮軍南下，奪取廣東，並在兩湖推進農民革命，準備建立獨立的「蘇維埃」政權。

爭論的結果，採取鮑羅廷的北進案，進軍河南，突破奉軍防線。正在前方決戰聲中，五月廿一日，長沙發生一件著名的反共事件：「馬日事

變」。

原來武漢方面，最失人心的，除了工人運動，還有「農民運動」；尤其是湖南的「農協鬥爭」。在「有土皆豪，無紳不劣」，「矯枉必須過正」的心理下，打土豪劣紳的辦法包括：「逮捕、監禁、審判、算賬、罰款、戴高帽遊街、殘殺……」等，簡直無法無天的到了瘋狂的程度。引起廣大民衆的不滿，以為「農民協會」是「不孝祖宗，欺神滅道，主張公妻……」的組織。

軍隊方面，尤其是控制武漢的主力唐生智的部隊，大都為湖南人，家屬在家鄉，受到「農協」的打擊摧殘，也激起了高漲的反共情緒。唐生智本人也曾經接到報告說：

「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，干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。在湖南境內，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，就寸步難行。」

當時，唐為了維持「反蔣陣線」，祇好暫時

忍耐，祇希望國共兩黨能設法糾正這種過激的行為。

可是，唐的部屬第卅五軍軍長何鍵，却忍無可忍，于五月十九日通電指摘湖南工農運動搗亂北伐後方；臨湘、益陽等縣的駐軍及團防局，已開始行動，解除工農武裝，佔領工農團體會所。

廿一日（馬日）凌晨，何鍵部許克祥團，在長沙開始大規模的清掃行動，收繳上千的工農武裝，逮捕工農團體重要負責人，佔領「湖南全省總工會」、「農民協會」等場所，隨即聯絡留駐湖南的五個團，一致反共。

此一行動，馬上得到兩湖人民普遍的響應，大家早已不甘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與社會鬥爭，以及「現金集中」、「糧食集中」政策。於是很快的成爲一種普遍的反共運動。

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士，自汪精衛以下，多採

取觀望態度；有人指斥中共不及早切實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行動，不約束他們侵犯軍人家屬的行動，才激成此一事變。

一向善於玩弄權術、機詐百出的鮑羅廷，震驚之下，還想親去長沙，加以調解；但遭許克祥拒絕。

五月廿九日，唐生智終於也通電反共；於是，整個的局勢，轉變得對中共非常不利。

正當此時，共產國際却在史達林的授意下，來份電報給鮑羅廷和羅易，希望他們能够促成：實行土地革命、沒收土地；由二萬武裝共產黨員及五萬農份子，組成新軍隊，消滅舊的軍隊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，增加工農領袖，代替舊領袖；組成革命法庭，審判「反革命派」。

這當然是不合時宜的一廂情願的想法，羅易却於六月五日當面送交汪精衛。這才使汪大夢初醒。

此其時，國民革命軍從南京、武漢齊頭並進的北伐戰爭，却得到輝煌勝利。五月廿七日馮玉祥部攻佔洛陽，六月一日唐生智部攻佔鄭州，張發奎部攻佔開封，六月二日蔣總司令部攻佔徐州。

武漢當局與馮玉祥約定六月十日在鄭州舉行會議。當時，武漢反共的趨向已逐漸明朗了，馮玉祥是受過蘇俄接濟的，動向如何，尚未表明。張國燾向「中共中央」自告奮勇的前往鄭州，希望能有機會影響鄭州會議，不致損及中共的立場。

可是，當他先和中共的鄭州負責人探詢情況

，却間接從馮玉祥部的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處得來消息，馮玉祥對武漢態度不好，傾向南京蔣總司令。

十日，他還是見到汪精衛，希望汪能對馮作有力的表示，爭取馮支持武漢政府為正統；至於國共關係與工農運動，是可以設法改善的。並且重新保證中共繼續支持武漢政府。汪精衛當時答覆他「可以試試」。

但，鄭州會議開會時，汪精衛為了迎合馮玉祥的意旨，大發反共議論，只希望馮能尊重武漢和他個人的地位。

張國燾知道內幕後，回到武漢，在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的會議上，主張退出國民黨，雖然對國民黨左派的上層分子不存幻想，但對中下層分子，仍應設法聯絡，取得他們的支持。鮑羅廷和其他委員，認為此事應先徵求莫斯科同意。

莫斯科的回電，還是採退讓政策，為了挽救武漢分共的危機，中共應該明白表示尊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，必要時中共黨員可以退出政府，過去若干作風可以更改，但不可以退出國民黨。「中共中央」根據這個政策，於六月廿日發表十一點政治聲明。

可是，汪精衛與武漢當局，在各方面強大的壓力和羣衆激憤的怒火之下，終于不得不於七月十五日開始「分共」。鮑羅廷等蘇俄人員，離開武漢，回到俄國。

中共內部，受此沉重打擊，在共產國際的約束之下，不無抑憤難洩之苦，於是，有人積極掙扎，有人消極失望，有人另尋出路。張國燾認為

莫斯科主要是為蘇俄的處境著想，而不是為中共的前途、利益著想，中共應當有一套自己的積極作為。

當陳獨秀隱藏起來，向「中共中央」表示無法繼續工作，瞿秋白也離開工作崗位，跑到廬山時；張國燾不勝憤慨的說：「難道中共就這樣散夥了嗎？我是絕不甘心的！」

於是，他召集周恩來、蔡和森、李立三等中共中委，舉行政治局會議，決定將「中共中央」政治局暫遷武昌，在當時左傾色彩相當濃厚的第四軍掩蔽下，繼續工作，將羣集在武漢的共黨份子，分派到各地，掌握工農力量，準備對抗國民黨。

汪精衛除了「分共」，為了維持他在國民黨的領導地位，又搞「東征討蔣」。支持他的第四軍張發奎部正向南昌集中。中共認為最可靠的部隊——葉挺的一個師和周士第的獨立團，也在開往之列。於是，大批中共黨徒，乃至仍與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，都湧向南昌；有的潛往他處潛伏工作，有的隱蔽在葉挺軍中，準備反抗國民黨。

毛澤東則自動願冒險回到湖南，領導農民武裝暴動。

周恩來接到李立三等自九江來信，主張在南昌發起暴動，由葉挺首先發難，聯絡湘鄂贛一帶工農羣衆，形成既反武漢又反南京的中心；然後移師廣東東江，藉汕頭海口，與蘇俄聯絡。

張國燾同意這項主張，未及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，即以中常委名義決定周迅往九江南昌，

組成「前敵委員會」，由周任書記，譚平山、李立三、惲代英、葉挺為委員，相機處理一切。

七月廿一日，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，由於鮑羅廷授意，立即提出改組「中共中央」領導問題，把此次中共失敗的責任，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；以維護共產國際與莫斯科的威信。

張國燾非常憤怒，他以為處此緊要關頭，不急於設法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；反而先在責任問題上搞鬥爭手段，把責任推到陳獨秀一人身上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共產國際的政策與事實脫節，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。

瞿秋白還強調他和鮑羅廷的協議，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，不能拘泥於道義；張國燾則堅持實際政治需要與真理道義，應當同時兼顧。

不久，共產國際又派了一位羅明納茲來華，他從瞿秋白處得知張國燾的基本立場，當即認為張是陳獨秀以外的中共的第二號右傾機會主義者，是共產國際最不放心的反對派。從此，張國燾受到連續不斷的打擊，最後不得不被逼再脫離「中共中央」。

南昌暴動失敗 再被攆斥

責難

在周恩來的積極策劃下，以南昌暴動為起點的計劃即可實現，預計以葉挺、賀龍部以及第三軍的教導團朱德部為核心。他們要求「中共中央」立即指示暴動方針，應變策略；他們急需蘇俄

軍事顧問協助，還有一筆巨款；以及到達東江以後，希望能獲得蘇俄軍火和物質的支援。

可是，羅明納茲起先還通知周恩來積極準備；但等到請示莫斯科後，却表示無錢支援南昌暴動，莫斯科已有電令禁止蘇俄軍事顧問參加，共產國際也有回電，主張不要發動，張發奎部中的中共黨徒可全部退出，派往農民中搞農運。結果，却要張國燾迅即前往九江，傳達此一電令與旨，停止此一行動。

張國燾祇好萬分無奈的「義不容辭」的去做這件「出爾反爾」的事。

廿七日，他到達九江，立即向惲代英、高語罕、關向應、廖乾五等人，傳達阻止發動的電令；但却遭到嚴厲的反抗，大家認為事情已經決定，何能反悔？並且怒斥共產國際和「中共中央」領導破產，甚至威脅他：「如果你再動搖人心，就要打倒你！」

卅日，他到南昌，與周恩來、李立三、彭湃、惲代英、譚平山、葉挺、周逸羣等會談，大家心情緊張，根本不願談到「成功希望」和「改變計劃」等問題。李立三也從實質上說明無法改變的原因：（一）已與賀龍部有密約，取得該部各師長的同意；（二）已密約駐在撫州的第三軍教導團朱德部，和在湖南平江的工農武裝領導人余洒度，按時舉事，響應行動。（三）限於時間，更改不及。（四）限於保密，有進無退。最後，周恩來竟以憤而辭職的姿態，反對共產國際再來干預此事。

素來責任感很濃厚的張國燾，竟然不顧他此來阻止暴動的初衷；反而宣佈支持「前敵委員會

」的原有決定，不改變暴動計劃。他本來應當返回漢口，向「中共中央」覆命，但因交通受阻，祇好隨軍前進。但他的領導威信，已受到打擊；除了照常參加「前敵委員會」，已無法挽救當時領導凌亂的局面。

七月廿一日深夜，暴動開始，葉挺、賀龍等部叛軍控制南昌四郊及城內各軍事要地，劫掠中央銀行，搜刮商店，拘捕國民黨員。

八月一日，由中共操縱，用國民黨招牌，成立一個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的政治機構，抓到一些事先並不知情，事發也不在場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如宋慶齡、鄧演達等裝點門面；而以譚平山為委員長，吳玉章為祕書長；張國燾也是委員之一。

八月四日，張發奎，和朱培德分別自九江、吉安等地率部圍剿叛軍。葉挺、賀龍等立即向南竄逃，途經汕頭、潮州，殺人放火，搶劫擄掠，為所欲為之後，逃往海豐、陸豐一帶，與彭湃會合，在「中共中央」的指示下，將「革命委員會」改為「蘇維埃政權」，會合農民，成立「工農紅軍」。但迅即遭到國軍的痛剿，而告瓦解。

「中共中央」迂迴上海，于八月七日舉行緊急會議，出席人員為瞿秋白、任弼時、張太雷、李維漢等人，在史達林的代表紐曼(Neumoa n)的指使下，發表事先由共產國際準備好的「告全體黨員書」，把中共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、譚平山、張國燾身上，指斥他們犯了嚴重的「機會主義」，而取消了陳獨秀的書記長，張國燾、

李立三、蔡和森、周恩來等在「中央政治局」的職務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「中共中央」再舉行擴大會議，決定「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，採用自下而上的發動暴動辦法，實現土地革命。」同時，清算南昌暴動，認為暴動其所以失敗，係由於仍然採用國民黨的名義和旗幟，是一種機會主義。因此，開除譚平山的黨籍（譚即登報聲明脫離中共），張國燾却以「未根據中央指示，去堅決領導南昌暴動；復假傳中央意旨，去阻止南昌暴動」的罪名，被開除「中共中央委員」的職務。

南昌暴動的最先計議，主張最力的周恩來回到上海，見風轉舵，立即表示完全擁護「八七會議」以後的中央，遵奉共產國際的指示，反對機會主義。他不但因此逃避了南昌暴動失敗的責任，反而重新躋進了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為委員，主管軍事和特務工作。

可是，張國燾不肯向「中共中央」認錯，所以「中共中央」也沒有安排他的新工作。他的生活極不安定，一方面忙着逃避警探的緝捕，一方面又被瞿秋白等視為「反中央」的首領。

以瞿秋白為首的「中共中央」，在紐曼、羅明納茲的指導下，却把暴動當做不二法門，唯一手段；帶來了一連串的慘敗，其中以十二月十一日的廣州暴動，關係最大；直接影響到中俄正式絕交。

張國燾曾勸瞿秋白放棄暴動政策，改弦更張，遭到拒絕。於是張與陳獨秀計議，另組「工農

黨」，即以原來的共黨同志為基礎，擴大其政綱要點仍為「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」；但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，而是國際主義的友黨。但因陳獨秀的慎重，未能定案進行。

被迫公開認錯 回國斡

旋黨務

共產國際為了彌補「中共中央」所產生的裂痕，謀求黨內團結；特別決定於民國十七（一九二八）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；並且不透過中共，直接邀請陳獨秀、蔡和森、鄧中夏、羅章龍和張國燾等五人前往參加。

陳獨秀表示不願再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，拒絕出席；於是，張國燾、鄧中夏等應邀前往。

在大會的預備會議上，因為張國燾被人認為他是「反對共產國際的代表」，所以首先應邀發表演說。他很技巧的表示：「中共領導的錯誤，不在於反共產國際，亦不在於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；恰恰相反，是太過於依賴共產國際」。同時，對「中共中央」的政策，多所指責，甚至坦率的斥責瞿秋白犯了嚴重的盲動主義。

開大會時，代表共產國際的布哈林作主要報告，承認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，犯了许多嚴重的錯誤；大會也批判了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。為了促進團結，張國燾、瞿秋白仍然當選為「中共中央委員」及「政治局委員」；但將他二人留在莫斯科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。「中共中央」由向忠發為書記，李立三任組織、蔡和

森任宣傳，周恩來任軍事、項英任工運；實際上由李立三領導。

中共黨內的紛爭，經過這項大會，總算解決了。原來被認為是中共左傾反對派領袖的張國燾，被人改稱為少數派領袖。

七月十七日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，張國燾是中共代表之一，當選為主席團的候補委員及候補秘書。大會對中國問題，決議以「推翻國民政府」、「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」和「建立蘇維埃政府」為中心的「十大要求」；成為此後「李立三路線」的根據。

十一月初，史達林直接處理中國問題，特約張國燾和瞿秋白去晤談。關心到陳獨秀被排出「中共中央」，可能會採取何種反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和作為？張國燾認為陳可能不再追隨共產國際，但也不可能在中國作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的政治活動。

三小時的談話，使張國燾覺得史達林是一個頗具風趣的現實主義者，並不如外間想像的那樣可怕。可是，他的演譯邏輯是够冷酷的。任何人如對共產黨不滿的表示，就會被視為「反共」，就會被他逮捕；即使是與他多年共患難的同志，也不例外。

共產國際六次代表大會以後，「反右傾」成為最主要的節目。李立三得到莫斯科「反布哈林右派」的鼓勵，在中國大張戈伐，首先開除蔡和森的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」，將他送到莫斯科；接着開除陳獨秀黨籍。（陳于十二月十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，強調擁護托洛斯基主張，反對共

產國際和中共中央，以示反抗。隨後又和共產國際派在中國的兩個德籍代表鬧翻，斥責他們「右傾」，不能代表共產國際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年十月十二日，中東事件發生，蘇俄軍隊侵入滿洲里與海拉爾，壓迫我東北地方政府，于十二月廿二日訂立「伯力協定」。並且鞭策中共，要他們「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，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中心，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」。民國十九（一九三〇）年七月廿七日，彭德懷的「工農紅軍」，乘中原大戰甚激烈之際，侵入長沙，佔領五天之久。這使李立三更為樂觀，認為「革命成功，為期不遠」了。

於是，他于八月間製訂一項「全盤革命計劃」，準備集中各地「紅軍」，再度進攻長沙，奪取南昌等大都市，並且要求共產國際立即命令外蒙古紅軍，進攻平津，蘇俄紅軍進攻東三省，以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行動。

他這套把蘇俄行動也牽涉在內的計劃，當然為共產國際的兩位德籍代表所反對。他却認為蘇俄紅軍為了中東路問題向東北進攻，中共曾極力配合支持蘇俄；現在該是蘇俄以實力支持中國革命的時候了，如果共產國際不能如此做，就是犯了右傾的錯誤，他將堅決反對。

消息傳到莫斯科，輿論譁然，李立三被視為「半托洛斯基主義者」，給反對者可乘之機；那時已經回國的陳紹禹（王明）的國際派，立即響應外合的，站在「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」的旗幟下，反對李立三。

共產國際為了糾正李立三的錯誤，根據在莫斯科的中共老幹部們的建議，想到派遣負責而有勇氣的張國燾回國去。但必須張國燾公開宣告過去反共產國際是自己的錯誤，現在已經毫無疑問的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。

雖然，張國燾心目中的共產國際，再也不是「世界革命大本營」，而是史達林鞭策各國共產黨人的指揮所。可是，他如果祇願回國反立三路線，而不願對共產國際表示忠誠；那將立即成爲鬥爭的主要對象。爲了早日脫離苦海，他應允第一次公開認錯，承認「過去對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曾有若干不滿，多半是自己的錯誤；最近一

年在莫斯科學習的結果，已經認清了。」並且在發言的紀錄上署名，以示誠意。

民國廿（一九三一）年一月，中共四中全会壓制了李立三路線，使李立三閒散到莫斯科；但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三路線的老幹部，而以陳紹禹等國際派掌握了「中共中央」的領導機構。

一月廿日左右，張國燾夫婦才回到上海，正趕上何孟雄等十七個老幹部被捕，（據說因反對陳紹禹等國際派，在東方旅館開會而全體被捕）大家人心惶惶之時。於是他祇好運用自己的聲望名位，與周恩來，向忠發聯合起來，南北奔波的努力，作團結疏解的努力。

王仲廉將軍著 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征塵回憶

平裝本台幣二〇〇元
精裝本台幣二五〇元

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- (一) 服務事項：1.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 代訂雜誌。3. 代印文件。4.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。(二)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。(三)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，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，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。(四)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，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。(五)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KAI FIDIOSCOPE MONTHLY

7-2 SHIN SHENG S. RD. SECD. 3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